

(上接第7版)

1969年

1月 据统计,从1966年至1968年11月底,中国共出版发行各种民族文版的《毛泽东选集》1.5亿多部,《毛泽东著作选读》1.4亿多册,《毛主席语录》7.4亿多本,“毛著”的各种汇编本、单篇本近20亿册,《毛主席诗词》9600多万册。

8月~9月 文化部及其直属出版单位的工作人员,除少数留京外,全部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各地出版工作人员也纷纷下放“五七干校”或工厂。

1970年

5月23日 国务院批准成立“出版口三人领导小组”。

(上接第7版)

# 行业携手共谱70年出版华章

## 古籍出版含英咀华取精用宏

■徐俊(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定《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再到新中国200余位文史专家、出版界通力合作完成校本“二十四史”,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出版持续不断,影响深远。

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于2008年9月由民政部正式批准成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指导和出版协会的领导下,本着“团结合作,平等互利”的原则,承担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从事古籍出版资源的开发,研究古籍整理出版及传统文化普及等重大课题,加强与各地图书市场的联系与沟通,开展向海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交流,更广泛地扩大在行业及海内外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首过往,古籍出版始终含英咀华、取精用宏,与共和国同行、共辉煌。

## 百废待举 古籍复苏 (1949~1958)

早在近代时期,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就曾先后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高潮。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出版业渐趋衰微,古籍整理出版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1949年新中国建立,万象更新。随着出版业分工的调整和实施,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开始复苏。一批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如《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古本戏曲丛刊》相继出版,一批思想性较强、艺术性较高的古典小说名著也陆续出版了新的整理本,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紧随其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陆续面世。195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二十五史补编》《诸子集成》,科学出版社出版《论语疏证》《管子集校》《四库提要辨证》,商务印书馆出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规划部署 继往开来 (1958~1966)

1957年1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批准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关于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报告》。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由齐燕铭主持小组工作,确定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制定整理出版文史哲古籍的十年规划,明确提出“在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应当动员和组织有关力量,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把我国古代和近代以至“五四”以前的主要学术著作有计划有系统地整理和出版”的目标。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经过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的系统整理阶段。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担任小组组长。小组成立后,确定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方针,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古籍整理出版重点规划《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分文学、历史、哲学三部分,1960年调整为《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后下发,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计划性大大加强,总体质量有所提高。

## 步履维艰 卓然有成 (1966~1978)

由于当时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古籍整理事业受到干扰,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开始,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工作,集中全国200余位古代文史学者,历时20年(1958~1978)完成,被誉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 改革开放 全面振兴 (1978~2003)

1981年春夏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同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随后,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新组建,由李一氓同志任组长。1982年初,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召开,讨论并制定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同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1991年6月,国务院任命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为古籍小组组长。1992年6月,小组主持制定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年)颁布实施。1993年,国务院下发文件,撤销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更名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小组组长、副组长及小组成员、顾问不变。1996年8月,颁布实施《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九五”重点规划》。

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石宗源同志担任,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顾问改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顾问。

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年)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并邀请部分小组成员和各学科专家组成了规划项目审议委员会,起草了“十五”规划草案。

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以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领导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了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 新时代下 高质量发展 (2003~2019)

2006年2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制订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2006~2010年)重点规划》正式颁布实施。2011年4月,《“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颁布实施,其子规划“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共85个项目。同年,古籍小组主持制订《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与此同时,截至2018年,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立民族古籍整理与研究机构,抢救、整理的散藏民间的少数民族古籍百万种(不含馆藏及寺院藏书),包括很多珍贵的孤本和善本。组织实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程,共收书目约30万种。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列论述,为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方向。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两办《意见》的出台,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指明了路径。各级党委和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提供了动能。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的普遍参与,为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增强了信心。

2019年9月,由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第34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上,“古工委”各成员单位就下一个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进行谋划,提出了八点规划思路:一是加强重点、重大出版工程,回应时代需求;二是重视古籍整理图书出版质量,体现内容生产精品化;三是依据各社专业优势,突出具有各自特色的重点选题方向;四是聚焦基本古籍,加强高质量深度整理;五是加大传统文化普及力度,力求专业知识大众化;六是加强地方历史文献系统整理与出版,服务地方文化建设;七是加强古籍整理与出版数字化工作;八是推进国际间出版合作,在出版海外所藏中国历史文献的同时,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和“走进来”工作。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古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精髓,记录了中华历史的足迹,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因子,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史证,是人类文明的瑰宝。站在70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与共和国同行,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古籍出版要有更高的时代站位,“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鲜活起来,生生不息。



10月 周恩来总理指示将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与“出版口三人领导小组”合并成立“出版口五人领导小组”,直属国务院值班室领导。

1971年

6月 新华书店总店外文发行所并入中国外文书店。

8月13日 中共中央转发《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1972年

10月 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原出版部门的一批老干部回归工作岗位。

12月23日 北京纸张供应站和中国印刷器材公司合并为中国印刷物资公司。(下转第11版)

## 抓大事干实事 科技出版再上新台阶

■吴宝安(中国版协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借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的东风,1981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科技委”)的创建工作被提上日程。作为版协成立的第一个工作机构,同时也是最大的专业委员会,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助力中国科技出版更上一个台阶?这是版协科技委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想科技类出版社所想、急科技类出版社所急、办科技类出版社所需”即是不变的工作方针和追求。

三十八载耕耘服务,一路艰辛,十分收获。经过岁月的洗礼,科技委早已从最初单一的委员会成长为全国科技出版工作者之家,扎实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充分发挥咨询、桥梁和纽带作用,得到了行业内外的肯定和一致认可。



## 打造科技出版工作者之家

翻开中国版协科技委30周年紀念册,相关征文随即映入眼帘——《有家的感觉真好》《是家,也是一所大学》《阳光般的温暖》……入选文章篇篇动情,令人印象深刻。科技委近160个成员单位几乎囊括了全国所有涉及科技出版的出版社,各个出版社把科技委当作是家,科技委也始终为大家服务,尽全力做好调研、交流、培训、评奖等主要工作。

首先是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是科技委履行职能的基础。近年来,科技委通过成立两个调研部,将调研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先后围绕当下热点难点问题,开展了对科技类出版社深化改革、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提质增效、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调研工作,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如2013年,调研一部和调研二部以及地方工作部历时3个多月,先后组织在京的23家科技类出版单位、30多家地方科技类出版单位召开了4次座谈会,就科技类出版社的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对策进行了集中调研。2015年科技委继续加大力度,调研科技类出版社在深化出版改革、建立现代出版企业制度、创新出版运行机制的具体做法和成功经验,科技类出版社在推动传统出版与新兴媒体在内容融合、技术融合、出版融合、产业融合、资本融合等方面的探索,用好用足国家支持出版产业政策发展的实践,以及科技类出版社在加强现代出版全面管理的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成绩。活动质量高、立意深,报告内容、系统性强,上交给版协和国家相关部门后引起很大反响。

注重交流沟通,总结推广经验,促进行业发展是科技委履行职能的重点。随着转型升级的深入和完善,出版社内部各个职能部门遇到了诸多新问题和困惑,科技委聆听到出版社的呼声,把工作的关注点下沉到出版社相关工作和相关部门,召开了数十次全国专题经验交流会和工作研讨会,如“新品数字图书机构服务模式”交流研讨会、“部分科技类出版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工作座谈会”、“数字教育与出版”论坛、“全国科技类出版社人力资源部主任工作座谈会”、媒体融合出版工作研讨会、“全国总编室主任工作研讨会”、“科技类出版社转型升级管理创新座谈会”等,收到了较好效果。

搞好培训,提升素质是科技委履行职能的基本工作。上世纪80年代出版界仍处于恢复、发展阶段,科技委即开始连续举办读书班、进修班、培训班等,以期提高科技编辑的素养。进入新时代后,据统计,仅近7年科技委就主办了策划编辑培训班7期、新编辑培训班7期、骨干编辑培训班5期、高级培训班3期,共计开班40多个,培训编辑总数为8747人次。学员纷纷表示,这些培训班是把他们引进编辑殿堂的入门班,也是编辑职业能力的深造班,更是科技委服务业界的招牌班。为了更好地为出版社培训人才,2018年,科技委成立了培训工作领导小组,从遴选教师到制定课程,从科学合理地申报到培训架构的制定,发挥了积极主动作用。同时还制定奖学金制度,激励学员们以优异成绩结业。

科技委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把“走出去”作为工作重点。近7年共组织5次“走出去国际合作”经验交流会,探讨了“互联网+”时代科技出版国际合作的战略、科技出版的国际交流与经营管理,以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建设对外话语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科技出版走出去等议题。

除此之外,科技委在评奖评优、挖掘优秀人才上持续发力,连续22年评选全国优秀科技图书,负责科技类“三个一百”原创图书评审等工作,不仅激励和调动了科技人员和科技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还向社会广泛宣传和展示了我国在科技和出版方面的优秀成果,为出版界评奖评优积累了经验,意义广泛且影响深远。

## 抓大事 干实事

面对新的时代要求和市场变化,未来科技委要抓大事,干实事;不添乱,多添彩。2019年科技委14个工作部重点部署14项工作,全部围绕这个原则。

发挥上传下达的枢纽职能,仍是科技委关注的头等大事。如中央推动出版业控品种、调结构,高质量发展政策后,科技委针对相关问题举办座谈会,一方面向出版社解释说明从政策上规范图书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好疏导工作;另一方面着手做好调研,反映科技出版高精尖、专业性、多品种少册数等特点,建议上级部门对科技类出版物管理分类施策。新的市场环境将会面对更加复杂的情况,科技委也将持续关注科技类出版物免税问题,继续呼吁把科技和教育提到同等地位。

继承优良传统,积极为地方社做好服务也是科技委的主要任务。科技委地方工作部始终活跃在全国各地,多年来成功举办各种别开生面的活动,如全国地方科技类出版社发行工作研讨会、全国地方科技类出版社社长总编年会、全国地科联订货会、地方科技类出版社主任工作年会、地科联九省“三农”出版联合平台出版规划与合作座谈会等,受到了会员单位的一致好评,未来将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把地方科技的品牌活动做大做强。

党建工作也是一大重点。2017年,科技委在人民邮电出版社召开了科技类出版党建工作研讨会,出版社转企改制以后,在改革发展以及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做好党建工作?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科技委怎样配合当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作为链接全行业的基本手段,科技委在办好网站上还大有可为。科技委网站自2009年11月6日正式开通,至今已运行近10年,期间经过了大小9次改版,网站内容更加丰富、实用、高效。同时通过建立年终总结奖励制度、开辟“行业法规与法律服务”栏目等系列创新举措,在业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也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近40年来,科技委始终从全国科技出版社角度出发,用心做好服务,踏实解决问题,与新中国改革开放同成长、共进步。相信未来必定更辉煌,未来更可期!

(下转第11版)